

第六章 結論：帝國慾望與南方的想像地理

日治時期日人文本的存在背景，自然無法單純以文學的時代風潮或主流文化來定位，它們絕對難以規避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，更不能自外於日本帝國擴張的歷史脈絡。文化或帝國主義都不是靜止的，因此他們之間作為歷史經驗的文學關聯，不僅是動態而且是複雜的¹。這些南方文本是作者在其歷史經驗下的產物，它們顯然也和文化與帝國主義有深層的共生關係。日本在占領台灣之後，把台灣再現成為具體的南方。一方面，殖民地賦予日人作家以豐饒的文學想像；另一方面，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顯然也對日本人殖民地知識之建構有所貢獻，甚至影響被殖民者的文學觀與歷史觀。

追溯日本作家開始對台灣投注興趣，是在明治時期的領台之初。因為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海外領地，日本國民對於台灣事物產生好奇，但是一般大眾的台灣知識又相當貧乏，文學者遂利用獵奇心態，積極以台灣為創作主題。這些作品多是想像之物，有些是以政治小說的型態出現²，顯示文學與擴張的帝國有所關連。這種南方熱潮，在 1904-1905 年（明治 37-38）前後突然消退，那是因為日俄戰役將日本國民的目光拉向北方。在島田謹二來台後，他才意識到明治文學者留下的台灣書寫，不僅成為一般讀者對於台灣知識的來源，也造成往後的負面印象，許多誤解更隨之而生，文學的力量可見一斑。島田謹二指出，對於內地日本人的台灣觀，勢必徹底理解明治時期的社會史，才能釐清各種的台灣事情，這也涉及到文學的社會影響³。島田謹二想要扭轉內地關於台灣的刻板想法，他期許外地作家能夠擔任這項任務，賦予南方以新生命。外地文學的內涵，是將目光朝向內地，將讀者限定為內地的日本人。這些文本並非被台灣人，而是被日本人閱讀，以此滿足他們的南方想像。另一方面，外地作家也藉此達到自我認同，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發言位置。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，受到當時代作家的矚目。然而，重新審視 1940 年代的文學創作，真正能夠落實外地文學論的作家，可說微乎其微。島田謹二所提出的文學觀點，限制文學的想像空間，更是政治意識的文化產物。許多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，其實也超越外地文學論的框架。

¹ 愛德華·薩依德（Edward W. Said）著，蔡源林譯，《文化與帝國主義》，台北，立緒文化，2001 年 1 月初版，頁 33-49。

² 島田謹二，〈明治の内地文学に現われたる台湾〉（明治の内地文學中所展現的台灣），《台大文學》，4 卷 1 號，1939 年（昭和 14）4 月。本文後來收入氏著，《華麗島文學志》，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95 年，頁 61-63。

³ 島田謹二，〈明治の内地文学に現われたる台湾〉（明治の内地文學中所展現的台灣），《華麗島文學志》，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95 年，頁 61-63。

從明治中期到 1940 年代日人作家所呈現的台灣，他們所帶來的文學／文化／地理想像問題，誠然耐人尋味。檢視他們南方書寫的內涵，可以發現其中歷經了三個階段的衍變：從領台初期混沌未明的南方憧憬階段，藉助各種文化與帝國論述的傳播，逐漸成為日本人集體的無意識，最後在戰爭期則演進而為日本帝國的強大意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敘事的權力，或者是阻礙其他敘事之形成發展，對文化與帝國主義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構成兩者之間主要關連之一⁴。外地文學強調以日人作家的台灣詮釋為正統，就是涉及書寫與被書寫的權力關係。日人作家的南方書寫，無時無刻都在透露帝國慾望的無止無境。在日人作家的凝視下，台灣成為被陰性化的客體，從原始瘴癘的蠻荒土地，逐漸轉變為具有撫慰身心的樂園隱喻，許多關於殖民地女性的性想像也隨之而生。台灣在確立南進基地的位置之後，則開始以雄壯語言歌頌南方之美。

不難發現，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，和台人作家的文學表現有極大的差異性。以「南方」觀來說，台籍作家龍瑛宗的〈死在南方〉⁵，藉由一對兄弟的跌宕人生，一方面批判台灣人精神文化之落後，一方面也在質疑「前進南方」的可行性。這個故事最後，哥哥發瘋、弟弟死在南方，而留在台灣的人們似乎也混混沌沌地活著。龍瑛宗的用意頗為鮮明，台灣人浮沉在殖民性與現代性之間，他們面對命運的態度是被動的，顯然不可能「自願」去南方。而另一位台籍作家呂赫若的〈清秋〉⁶，一開始以「歸鄉」起頭，主角耀勳是一位學成回鄉的新式知識份子。〈清秋〉的時代背景，正是戰爭臻於高峰的 1940 年代。作者以「志願到南方去」做為整部小說的關鍵點，讓故事主角徘徊在留或不留（故鄉）、去或不去（南方）的抉擇上。台灣人對於「志願到南方去」的響應與否，在〈清秋〉出現了遲疑的態度。相對而言，日人作家的「南方」觀，除了帶有異國情調的刻板幻想之外，也投射強大的帝國慾望。

台灣與日本的關係，原本就是權力、支配和殖民者系統的複雜交錯關係，他們的南方敘事都是日本對台灣權力施展的符號展現。不論是 1910 年代的竹越與三郎、中村古峽，1920 年代的佐藤春夫，或者 1930 年代的中村地平、真杉靜枝，都以內地作家的身分留下具有繁複意象的南方敘事，然而他們和殖民地的緣分都沒有外地作家西川滿來得深刻。不過，在西川滿陰柔美的文學表現下，南方也成為一個頹廢而充滿魅力的所在。必須要到戰爭期之後，西川滿才著手進行戰爭文學的書寫計畫。1940 年代由西川滿主導的《文藝台灣》，成為外地文學的實踐場域。《文藝台灣》創刊於文學動員的年代，這本雜誌的作家組成與文

⁴ 愛德華·薩依德 (Edward W. Said) 著，蔡源林譯，《文化與帝國主義》，台北，立緒文化，2001 年 1 月初版，頁 3-29。

⁵ 龍瑛宗，〈南方に死す〉（死在南方），《台灣時報》24 卷第 9 期，1942 年（昭和 17）9 月 5 日。

⁶ 呂赫若，〈清秋〉，收入小說集《清秋》，1944 年（昭和 19），台北：清水書店。

學風格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逐步遵循官方政策的走向。西川滿刻意拉攏內地和台灣有影響力的日本文藝人士參與，不僅發揮自己的人脈力量，也達到掌控《文藝台灣》的目的。《文藝台灣》透過畫家和作家的相互結盟，展現西川滿薈萃南方文化的雄心壯志，表現令人驚艷。近年以來，日治時期台人作品的討論與研究已漸趨成熟，不論是全集的出版，或是學術研討會的舉辦，都得到極大的肯定與注目。相形之下，日人作家的文本研究卻極為貧乏，語言誠然是一個問題。現今，台人作家日文作品的翻譯，多已完成。但是在戰爭期佔據重要發言地位的《文藝台灣》，到目前為止作品多未被翻譯成中文。在 2006 年所出版《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》，已經處理到《文藝台灣》的評論部分⁷。文學的部分，則有待努力。這些作家在日本文學史上也許不見經傳，除了幾位日本學者的研究之外，極難找到相關的研究文獻。但是他們的作品對台灣文學史而言，絕對是有價值性的文獻。回溯歷史現場，當時日人作家和台人作家或是對峙、或是合作，還是得置諸於文學集團來討論，才能彰顯其意義。

在決戰期之後，日本帝國論述所指涉的「南方」，有逐漸擴大界限與範疇的趨勢。這樣的南方，實質是如此空洞，卻成為一個鮮明的戰爭符號，存在於日本人的心中。弔詭的是，1940 年代的三部長篇創作，對於「南方」已出現紛歧的情感。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蔓延，《陳夫人》和《南方移民村》所指涉的「南方」，已脫離台灣的範疇，只能往南洋延伸。所謂南進基地台灣，甚至成為不得不離棄的所在。為了更美好的願景，「前往南方」變成勢在必行的抉擇。在此，台灣已無法承載帝國的慾望，「南進」的意涵，反而逐漸顯露敗戰的預感。三部小說中最晚完成的《台灣縱貫鐵道》，是這三篇作品中唯一有明朗結局的作品。西川滿埋首書堆閱讀史料的身影，是一種將自身跳脫現實而轉向歷史尋求慰藉的姿態。西川滿以帝國觀點重新詮釋台灣歷史，透過台灣開拓史的現代化與殖民化過程，投射向南延伸的帝國慾望，和〈赤崁記〉一樣鑲嵌了附和南進政策的戰爭語言。日本的南方開拓之旅，存在著帝國勢力路線朝向蠻荒開發的背景，也對日人作家的南方書寫有頗大啟示。不言可喻的，這些作品具體呈現了文化和帝國主義的關係。

沒有台灣，就沒有南方。「南方」的地理方位，是以日本為中心座標，而所謂「南方」的內涵，從原初的地理位置概念出發，逐漸貼近於日本帝國主義論述下的南方類型，進而形成一種政治無意識（political unconscious）。南方的概念，可以透過各種南進論述被標籤化，進而化約成幾個簡單的印象，並且成為一種想像南方的思維模式。南方作為被觀看的客體，透過各種話語敘事，從模糊的概念

⁷ 請參閱黃英哲主編，《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》（雜誌篇，共 4 冊），台南市：國家台灣文學館，2006 年。

也逐漸顯現清晰的形體。到了南進政策明確的階段，「前進南方」不再是隱而未見的無意識，它一躍而為昭然若揭的意志、隨處可見的口號，充斥在日本內地與殖民地。在南進論與軍國主義的積極運作下，日本更意圖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的發言人。當太平洋戰爭逐漸臻於高峰之際，日本學界以亞洲文化主體的區域性統合為理由，刻意凸顯東洋與西洋的差異性，而提出「近代的超克」，宣稱要超越西方的近代性。在美學追求上，則有回歸東洋美的聲浪。「近代的超克」所揭櫫的意義，是為了合理化大東亞戰爭與南進政策的理想主義色彩；以「大東亞共榮圈」做為建設日本、東亞、東南亞共榮共存的目標，一方面足以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另一方面可創造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。

南方所涵蓋的意義，或者說是範圍，雖然沒有明確的界線，但是相當明顯的，它有逐漸擴大的趨勢。從模糊未明的南方，到以台灣為主的南方想像，大約是明治中期到大正時期的南方印象。昭和時期以降，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後，作家筆下的「南方」，開始出現膨脹的想像，這種發展誠然和大東亞共榮圈、南進政策下的戰爭時局有緊密聯繫。南方的空間範疇，透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，在日人作品中展演了延伸空間、延長時間的可能。它從未明到定名，這個階段它可能是南太平洋的任何一個地方。19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所欲求的「南方」，指涉的地理位置可能是中國、越南、爪哇、蘇門答臘、波羅洲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汶萊……。例如佐藤春夫、中村地平與真杉靜枝等內地作家都在決戰期親赴戰場，用具體行動應援南進的可行性。決戰時期的南方概念，已經不再是點或線的單獨地區，而是向外張開的大東亞版圖。

可以看出日本急欲尋求日本未來的出路，因此不斷透過言說：往南、往南。然而，這些南進書寫似乎也在弔詭地預言南方的不可行性。未名的南方，是從點到圈的擴張，也是帝國無限延伸的欲望。「南方」的可塑性在日人文學中，先是以未名的姿態現身，而在佔領台灣之後為南方想像的容器注入具體的模型，南方形象逐漸出現清晰的樣貌。隨著南進政策的明朗化，南方的地理位置展現了向南推進的無限可能性，南洋群島的任一個島嶼，都極可能成為新的南方指喻。在戰爭末期時，如同《陳夫人》或《南方移民村》所昭示的結局：台灣已非樂土。這顯然是一個隱喻，它暗示了「南進」的勢在必行，卻無意中卻流淌著一股日本敗戰的預感。沒有明確界限的南方，成為一個鮮明的戰爭符號，只存在於日本帝國的想像地理版圖。終究，南進論因為日本敗戰而成為一個未完成式。南方作為帝國欲望的指涉物，在不同領域曾經被無邊的想像與詮釋，如今也變成被放大檢視的一段歷史。換一個角度來說，相對於南方憧憬，日本在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中，毫無疑問也出現了關於「北方憧憬」的文化產物。這誠然又是一個大課題，也是筆者未來計畫的研究方向。

今日，日本的殖民主義已經終止了，但是當年帝國主義所建構的南方論述，或許還殘存於日常普遍性的文化領域，或是特定的政治、意識型態、社會慣例當中。對現今的一般人來說，縱使他們已經遺忘戰爭的陰影，也不甚了解南進政策的政治內涵，但是所謂的南方概念，可以透過各種南進論述被標籤化，從而化約成幾個簡單的印象，並且成為一種想像南方的思維模式而被殘留下來。本論文企圖以再閱讀與再詮釋的方式，進入南方論述的歷史脈絡，探討日治時期日人作家所形塑的南方憧憬，並解構日人作家所建構或虛構的南方敘事。從後殖民批評的角度，細讀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，以重新回顧歷史與文學的虛妄或真實，當是可以欲求的。本文的書寫意義即在於此。

